

探寻中国兵法制胜之道 ②

将德修炼是研兵学谋的根基

■李炳彦

核心提示

●《孙子兵法》作为“兵权谋”的代表作，是一座智慧殿堂和谋略宝库。当我们走进这座殿堂，寻求制胜方略时，应当把将德修炼作为研兵学谋的根基。

●《孙子兵法》在“计篇”中指出：“将者，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也”。这五个字，是为将者的五条标准，也被称为将之五德。

(一)

智是谋之源，谋是智之用。我们常说，足智多谋。孙子说的智，不同于今天说的智商。智商很高的人，若没有成熟的修炼，常常变成一种小聪明。作为军事将领的智，应当有以下突出表现：

首先是预见力。历史上那些能征善战的军事家，都具有超人的预见力。预见力又分战略预见和战术预见。战略预见是关于全局性、长远性的预见，“预见存亡祸福之原，早知盛衰废兴之始，防事之未萌，避难于无形”。战术预见则主要是对具体事件发展前景的预见，“见事而知得失成败之分，而究其所终极，故无败业废功”。军事作战中，指敌情判断，知彼知己，料敌致谋。

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说：“坐在指挥台上，如果什么也看不见，就不能叫领导。坐在指挥台上，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，那是平平常常的，也不能算领导。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，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，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，并能掌握住它，这才叫领导。”领导就是引导，引导必须有先见之明。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，每一项重大决策，都是以超越常人的预见力，在最困难时看到希望，在黑暗中看到曙光，在迷茫中看清道路，在胜利中看到新的挑战。

其次是决断力。决断力和预见力相关联，分为战略决断与战术决断。战略上的决断，重在审时度势，对时代、历史、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有正确的认识，关键时刻能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。战术性的决断，是正确地选定战役战术行

动计划。毛泽东同志说过，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，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，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，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。

第三是创新力。与预见力、决断力相关联，智的又一个重要内涵是创造力，或者说创新力。善于创新的人，首先是观念的不断创新。新的观念产生新的想法、新的思路。而陈旧的理念则是禁锢人们创造力的枷锁，阻碍新思想的最大障碍。

提高创新能力固然需要知识，但知识不等于能力。只有在艰苦奋斗的实践中，才能把知识转化为创新力。军事指挥员尤其要重视在实践中磨炼。历史上不乏赵括之类的人物，饱读兵书，却打败仗；也有如汉代霍去病这类的人才将领，没读过兵书，用兵打仗“每每和孙吴暗合”。当然，这不是否定读书的重要，而是反复论证一条真理：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”“读书是学习，使用也是学习，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。使用的过程，也就是修炼提升的过程。

第四是运用资源的能力。对军事指挥员来说，是力量运用的能力。力量与力量的运用不同，所以战争史上出现了许多以弱胜强、以少胜多的战例。运用资源的能力，“形而上”的叫艺术，“形而下”的叫方法；高超的艺术是伟大天才的思维闪光，科学的方法要靠学习去把握；艺术是通过实践去领悟，“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”，方法是在运用中不断提升。艺术与方法常常是融合的，表现为战略战术的筹划、战略策略的设计、战略路线图的描绘、战术计谋的构想，等等。

第五是识人用人的能力。识人用人看似简单，实则不易，可以说是指挥员经常困惑的一件事。诸葛亮足智多谋，结合自己的实践，写出《将苑》一书，主要论述将性、将道、知人善任等。但

属感的一种体现。

解放战争中，我军在接收“解放战士”后，通常会以班排为单位组织“诉苦大会”。战士们倾诉起入伍前被地主恶霸欺压的苦难生活，动情处往往会放声痛哭，其他人也会产生强烈共鸣，纷纷落泪。此时，不光“解放战士”，所有官兵都会在情感共鸣之时，同声相应、同气相求，融为一个团结的集体。在这个集体中，所有人身份平等、目标一致，都能够找到强烈的归属感。如此，在社交需求和尊重需求被满足的基础上，官兵就能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，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——为了信仰而战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官兵一致意义重大。它不仅是官兵从物质需求上升到精神需求的关键环节，还是一支部队能否将战斗力真正发挥出来的基本前提。事实上，官兵一致作为我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之一，一直是我军的优良传统。在三湾改编中，我军就提出“军官不打士兵、官兵待遇平等、官兵同灶吃饭”。在彼此平等的条件下，地位差别和身份差异被消除，显然有助于增强部队的凝聚力乃至战斗力。“解放战士”之所以那么快变了个人，就是因为我将官兵一致、官兵平等落到了实处，使大家获得了归属感、认同感，在互相尊重、同甘共苦中结为亲密战友。

时代在发展，社会在进步，践行官兵一致原则也应该与时俱进。新时代青年官兵更加重视民主意识、权利意识，对官兵一致看得更重、要求更高。干部骨干应紧跟时代步伐，改进带兵的方式方法。一是依法带兵，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，杜绝以言代法、以权压法、搞土政策；二是摒弃“官位”意识、“等级”观念，主动带头、率先垂范，平时敢说“看我的”，战时喊出“跟我上”，用实际行动增强官兵之间的互信互爱；三是以情带兵，防止谈心交心变成例行公事，切实把解决官兵“急难愁盼”问题放在心上，落在行动上。

他还是错用了马谡，造成街亭之败。其实，马谡也是个人才。诸葛亮南征时，他提出“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；心战为上，兵战为下”的见解，还是很有见地的。只不过，马谡缺少实践历练，作高参可以，担任一线主将，其指挥实际作战能力弱的缺点就被彻底放大，最终导致蜀军全线被动。总括起来讲，诸葛亮对马谡是用错了岗位。

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清末湘军将领曾国藩在功成名就时，要求他的将军们读乾隆时期重臣孙嘉淦的一篇议奏——《三习一弊疏》。旨在提醒手下将领越是在战场上打得顺风顺水的时候，越要戒骄戒躁，越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。否则，就很容易丧失识人用人、量才录用的能力。

(二)

为将的信誉、诚心，可直接转化为军队的战斗力。“信盖天下，然后能约天下”。将军带兵，守信用才能得到部下的信任，而信任就是带领团队走向光明的火炬。战国时期，商鞅主导秦国改革，首先“徙木立信”，顺利拓开改革之路，是个范例。

孙子讲的将德，是战略“五要素”（即道、天、地、将、法）之一，将德中的“信”，自然与“道”相联系，包含了信念这个信誉的灵魂。

习主席高度重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军事文化，多次强调“为将之道，当先治心”。崇高的理想、坚定的信念，是革命军人的灵魂，是克敌制胜、拒腐防变的决定性因素。从人民军队成长历程看，我军的将帅始终有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，有着不变的理想和信念，带领的是人民军队，打的是人民战争，所以能创造出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。

有信念就必然有自信，有自信方有意志力。面对重重战争阻力，为将者有自信，部队就能看到希望之光，就有必胜的勇气，就能形成“激流漂石”之势。为此，一是突出理想信念的引领作用，前者是充满自信心军队的表现，后者是完全失去自信心军队的状态。

(三)

仁，本来是儒家思想的核心。中

国古代兵家价值观为儒道合一，把仁作为将德修炼，主要强调爱兵亲民。《孙子兵法》讲：“视卒如婴儿，故可与之赴深溪；视卒如爱子，故可与之俱死。”

作为指挥员的仁，还表现为礼贤下士、尊重人才。有个典故叫“周公吐哺”，说的是周武王死后，年幼的成王继位，周公肩负起辅佐成王的责任。周公非常礼遇有才能的人。有时他正在吃饭，门人报告有贤士来访，周公立即将口中的食物吐出，迅速出来接见来宾。如此一来，有才能的人都聚集到他的身边，服务于周王朝。所以，“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”，成了对“仁”的最好注释。

(四)

一般情况下讲勇，多指两军阵前，奋不顾身、奋勇杀敌的英雄豪气。为将者，平时不贪财，战时不惜命，军必兴。

将德修炼中的勇，更重要的还在决定军队、国家命运的重要关头，表现出的沉着稳定、无私无畏、从容应对的胆略和风度。“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，然后可以制利害，可以待敌”。

“但用东山谢安石，为君谈笑静胡沙。”诗词是唐代李白对一位军事将领的赞誉。这位将领就是在淝水之战中指挥东晋军队，打败前秦百万大军的谢安。他在大敌当前、国家处于危急的时刻，镇定自若，从容应对，独静思，运筹破敌良策，终于以少胜多，扶大厦之将倾。

(五)

这里讲的严，是严军纪。军纪严明，才有执行力、战斗力。严的前提是明，军纪不能光讲抽象的道理，而要有简洁明了的可执行条文。我军的“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”就是典范。华为为员工提出“以制度管人，以流程管事”，其中要求做到“五个必须”：对要做的每个项目，首先必须有明确的目标，有目标必须有计划，有计划必须有方案，有方案必须有检查，有检查必须有结果。这样，不流于一般口号，每件事都能落到实处。

在各种制度、纪律中，与人关系最密切、最经常、最直接影响战斗力的是赏罚制度。对此，古代军事家提出了四条原则：赏不逾时，罚不迂列，赏不避小，罚不避大。军事史上有很多严明军纪的故事，如孙武吴宫演阵斩王姬，田穰苴辕门立表斩庄贾，周亚夫细柳行军令等，都传为千古佳话。

(六)

孙子讲的为将者五德，是一个整体，是相辅相成的综合思想品格。智者不迷，信可领众，仁能聚力，勇者果敢，严必立威。有兵家评说：“非智不可以料敌应机，非信不可以训人率下，非仁不可以附众抚士，非勇不可以决谋合战，非严不可以服强众。全此五才，将之体也。”又有一评说：“专任智则贼，偏施仁则懦，固守信则愚，恃勇力则暴，令过严则残。五者兼备，各适其用，则可为将帅。”总之，将德修炼，在于五德合成，全面发展。

《孙子兵法》产生的时代，是中国古代复杂系统哲学形成的时代。孙子运用太极阴阳哲学观，研究战争、研究将帅品格修炼，非常强调“度”的把握。于是，一方面强调将之五德，一方面又讲到将之“五危”。“故将有五危：必死，可杀也；必生，可虏也；忿速，可侮也；廉洁，可辱也；爱民，可烦也。凡此五者，将之过也，用兵之灾也。覆军杀将，必以五危，不可不察也。”其实，将之五危，正是将德修炼错位的表现。比如，足智多谋是将德之首，但智用过就可能狐疑不决。《六韬》中说，“用兵之害，犹豫最大；三军之灾，莫过狐疑。”

“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；圣人之道，为而不争”，这是《道德经》最后的结语。孙子论述将德修炼，在吸收道家的价值取向中，蕴含着以出世之心态，做人世之功业，大智不彰，大功不扬。“故进不求名，退不避罪，唯人是保”，使将德修炼升华为“内圣外王”的境界。

新征程上新使命新担当，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弘扬中国古代优秀军事文化中的优秀因子，赋予将德修炼以时代新内涵，不断为打赢未来战争造就可堪大用之才。

群策集

随着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，新一代高科技装备快步登上历史舞台，正加速推动战争形态演变、作战方式升级和作战手段更新。战争实践中，高科技装备经常会因机制特殊、形式新奇而带来不俗战果，容易让人对其性能和作用过高估计。正确的做法应该是，真正掌握高科技装备的原理，认清其优缺点、强弱点，切不可过度依赖高科技装备。

避免因过度依赖产生误判。军事科技充满对抗，是在对抗中螺旋式上升的。“矛”的锐利必然加速“盾”的坚实，本质上没有任何技术是无懈可击、不能被超越的。在抗美援朝战场上，志愿军将士克服大口径火炮易被美军空中侦察的弱点，以汽油桶制作的土制“飞雷炮”给予敌人迎头痛击，一度被美军误认为是大口径火炮。这启示我们，对高科技装备的正确态度应当是相信不迷信，对原理钻研学习力求入木三分，力避一知半解。未来战场上，一方面，应充分发挥高科技装备的作战效能，最大限度彰显其威力；另一方面，应防止过度依赖高科技装备，通过“科技+人工”“数据+依据”相结合的方式，弥补高科技装备的缺陷和不足，防止对战场态势产生误判。

切莫过度依赖高科技装备

■郝东红

避免因过度依赖滋长骄气。正如恩格斯所说，枪自己是不会动的，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。在人类战争史上，装备精良的军队未必都是常胜之师，技术先进的一方也未必是战争的最终胜利者。如果一支军队过于依赖先进的技术、精良的装备，而忽视体格锻炼以及战斗精神、顽强作风的锤炼，易滋生“骄”“娇”二气，在艰苦的战斗环境下失去进取心、丧失战斗力。抗美援朝战争中，被美军俘虏的一名美军连长曾说，“美军的部队对武器装备特别重视，甚至是过于重视，可是在战略战术和官兵的精神力方面却严重忽视了，这也许就是我们经常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败的原因”。未来战场上，在拥有可与强敌相抗衡的高科技装备的条件下，也不可忽视精神利剑的砥砺，要像重视武器装备升级换代一样，强化官兵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，培养敢于压倒一切敌人的必胜信念，使得武器装备与精神利剑同放异彩。

避免因过度依赖陷于被动。俗话说，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。高科技装备尽管有其先进、高明的地方，但同样有操作复杂、适应性差，对技术保障依赖度高等缺点。有报道显示，美国“阿帕奇”直升机每飞行1.5~2.4小时就得检修一次；法国“美洲豹”运输直升机每飞行1小时，就需要一名技师保养20小时。各豫不虞，为国常道。实践中，我们既要避免陷入“吃啥啥不剩”的窘境，也要确保战时精密的电子设备发生故障时，能够靠过硬的技术水平化险为夷。因此，平时训练时既要学“电脑”也要练“人脑”，把纸上筹谋、能写会画的功夫练到位；既要强化“立体化”投送能力，也不能忽视磨炼“铁脚板”，努力提升全天候全域作战能力；既要学好用好夜视仪、无人机，也要确保离了高新装备射击准头不失、侦察精度不降，时刻保持战斗力。

践行好官兵一致原则

■杨珍妮

挑灯看剑

一支部队能否形成强大战斗力，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看能否上下一心、同心协力。而想要达到戮力同心，官兵一致、官兵平等是重要前提。

心理学家亚伯拉罕·马斯洛将人的需求自下而上分为五级：生理需求、安全需求、社交需求、尊重需求和自我价值实现需求。如果说生理和安全是初级需求，那么社交与尊重就是中级需求，而自我价值实现则是最高等级的需求。官兵一致，表面上是身份地位上的相对平等，其实是身份认同和找到归

管窥智能化时代军事体系建设

■唐 蓊 彭思勇

前沿探索

随着智能化时代的到来，武器装备迭代更新，作战力量不断重塑，作战样式持续演进，未来战场将进一步呈现全域一体、跨域联动、体系融合的特点，急需构建以军事理论牵引智能化为先导、以组织形态适应智能化为保证、以武器装备全面智能化为基础的完整体系。

深化智能化时代军事理论的研究探索。越是智能化大变革时代，越需要强有力的军事理论支撑，以实现从“兵种运用”到“体系构建”的转型、从“经验总结”到“概念设计”的转变、从“跟进强敌”到“颠覆超越”的推进。为此，一是要突出理念的前瞻性。在理念创新、概念开发、系统设计等方面具有超前预判和开放构思的逻辑驱动力，突出强烈的危机意识，研判智能化时代军事威胁总体态势，牢牢把握智能化时代战争的特点规律，树立体系思维、数据思维、算法思维，催生智能化时代作战体系运用新概念、制胜新机理。二是要强化理论的系统性。对作战体系基础理论、应用理论、技术理论、训练理论、管理理论、保障理论等进行系统规划，将建设、运用、训练理论进行整合，将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进行结合，将传统理论精华和创新理论运用进行融合，构建

体系完整、内容系统、突出实战、智能引领的作战理论体系。三是要探索方法的先进性。注重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作战理论验证中的运用与实践，创新手段与方法，提升智能化时代军事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。

激发智能化时代组织形态的强大活力。组织形态是军队高效运转的有力保证，智能化战争更加复杂、节奏更快，尤其需要高效运行的组织形态。为此，一是要强化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嵌入力。将多元作战力量、多种作战行动、多维战场空间综合集成，形成智能化、网络化指挥结构，建立层次简明、上下贯通、横向灵活的作战体系，具备智能“嵌入”功能，可根据作战需要实现智能化一体运用。二是突出联合作战战斗力体系的较链性。形成打破军种界限的联合作战力量体系，以战斗力要素为牵引，将分属于各军兵种的各种作战力量进行智能化综合集成，形成功能完整、结构优化的联合作战要素主体，构建多功能、多级别、智能化作战体系，实现多域的融合、力量的联合，满足战略、战役、战术级联合作战需求。三是深化联合作战运行机制的匹配度。建立适应联合作战体制的联合作战行动组织指挥机制、作战筹划机制、协调控制机制、信息交互机制、信息查证机制，推动传统粗放式作战向作战规则推动、作战程序规范、作战流程管控

的精准式作战转变，并建立与联合作战筹划、联合作战行动相适应的智能化作战体系配套运行机制。

理清智能化时代装备发展的超越路径。武器装备是战斗力的重要组成因素。智能化时代，应着眼智能化战争特点、智能化作战环境等，加快新的颠覆性武器装备的研发。一是聚焦联合作战能力。运用工程化理念设计、实施作战实验，得出联合作战不同作战规模情况下的作战能力需求清单，通过联合作战能力需求研究牵引智能化时代体系装备的发展，以建强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的武器装备体系为落脚点，以生成对应的全域作战能力为关键指标，确保装备智能化建设契合智能化作战需要，有效应对智能化时代的各类威胁挑战。二是适应新型战争形态。针对战争形态的快速演变，装备技术的快速迭代，围绕装备的火力、机动性、信息力、耦合力等需求，研发新机理新体制装备。在突出装备单装功能的同时，突出装备智能化、自组织、高集成，使得武器装备作战效能倍增，形成以新机理新体制装备为主体的智能化时代武器装备体系。三是瞄准未来作战需求。紧盯未来作战对手、作战环境等，运用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数据挖掘、机器学习等先进技术，构建大数据强库、智能化云平台、有人/无人混合编组、分区分阶段、有序有重点地推进武器装备建设发展。